

武
安
国

烟
雨
斋
丛
稿



烟雨斋丛稿

武安国 著

敬增校图

海国

2000.11

目 录

社会治乱与文学盛衰·····	(1)
借男女情事以寄意	
——谈古诗的一种比兴手法·····	(10)
元诗试论·····	(19)
唐诗析疑·····	(29)
疑义相与析	
——读唐人绝句札记·····	(43)
崔颢诗论·····	(55)
王维诗中的人情美·····	(66)
李白诗中的诸葛躬耕处·····	(71)
柳宗元《三戒》别解·····	(76)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	(80)
《嫦娥》诗主题小议·····	(88)
苏诗的讽刺与幽默	
——纪念苏轼诞生九百五十周年·····	(91)
元好问在南阳·····	(102)
“江南三绝”说乃贤·····	(117)
彭而述的《读史亭诗集》·····	(129)
古诗十首比析·····	(141)
杜甫夔州诗三首赏析·····	(152)

借形写声 惊天泣鬼

——赏析两首描写音乐的唐诗…………… (160)

古代江南农村的生活画卷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赏析…………… (165)

郝经乐府诗五首赏析…………… (171)

清诗四题赏析…………… (188)

丁林诗词四首评析…………… (197)

《长江三峡》的写作特点…………… (207)

《苏州园林》的写作特点…………… (211)

古诗的理趣…………… (215)

说“诗家语”

——与老年朋友谈古诗的阅读…………… (220)

满目青山夕照明

——为“国际老人年”作…………… (224)

我国古代养老优老敬老之礼…………… (231)

知识分子的光辉道路

——评所谓“何其芳现象”…………… (234)

祝贺与期望

——《白河》副刊二百期贺辞…………… (239)

求实创新谱新志

——评《南阳县志》…………… (241)

谈文学教学中的比较法…………… (248)

语文教学中的文道合一和审美教育…………… (260)

豪华落尽见真淳

——读《清水吟草》…………… (271)

社会治乱与文学盛衰

文学的昌盛或衰落，有其自身传承，发展、革新、创造的内部规律，同时又和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而统治者的学术政策及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对于推动或压抑文学创作的发展，又常常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提出来探讨的问题是，社会的治乱与文学的盛衰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许多文学史研究者，根据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论断，把文学的繁荣直接归结为经济繁荣的结果，可是文学史上的许多事实并不符合这个公式。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汉唐明清四个王朝，都是强大的封建帝国，都有过自己的太平盛世和处于各自发展阶段的经济高涨。但是文学却并未全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普遍繁荣的高潮，反而较多地呈现出逆向发展的态势。

西汉前期，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从文帝开始汉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济空前繁荣，财富充盈，粟陈贯朽，社会秩序安定。文帝时，一年之中全国判重罪的案子总计不到四百起，甚至连肉刑也取消了。到武帝时，国力富厚达于极点，虽然由于长期战争损伤了社会元气，但到宣、昭之时，社会又再次呈现繁荣景象。然而在这一百三十余年间，在封

建的政治经济蓬蓬勃勃向前发展的同时，文学却不能说有什么卓著的成绩。除了贾谊、晁错的几篇政论，司马迁的几十篇人物传记和一、二十首乐府民歌而外，似乎再没有可以称道的作家、作品了。这和前一历史时期百家争鸣的热烈场景相比，显得萧条冷落多了。

唐代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无疑是唐代文学全面繁荣的原因之一。但社会政治经济的鼎盛时期，并非文学繁荣的高峰期，二者的发展不是同步的。从贞观到开元，是李唐王朝的极盛时期，农业、手工业不断上升，城市商业空前繁荣，风尚纯朴，社会安定，出现了象杜甫在《忆昔》诗中所描绘的那种太平景象：“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皆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文学创作这时也正在积极开拓前进的道路，酝酿着历史性的突破，但还没有达到光辉灿烂的阶段。唐太宗时期，诗坛上还弥漫着齐梁余风，虞世南、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都是写宫体诗的著名诗人。高宗、武后时期的“初唐四杰”，虽然写出了一些清新刚健的作品，但总的倾向仍然没有摆脱齐梁的浮艳习气。陈子昂自觉地起来反对宫体文风，提倡汉魏风骨，并在创作实践中写出了一些慷慨雄健的诗歌，但他的作品数量少，艺术水平不高，缺少独创性。到了开元年间，王、孟、高、岑、李、杜相继登上诗坛，人才济济，蔚为大观。但具体考察起来，这些大诗人们的创作旺盛期，大多不在开元盛世，而在开元末或天宝年间。王维才华早熟，开元初年已有诗名。但是他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真正能显示其艺术个性的作品，却大都创作于开元末和天宝年间。高适的《燕歌行》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其它优秀的边塞作多作于此后。

岑参于天宝八年赴安西，《白雪歌》作于天宝十四载。李白的绝大部分代表性作品，都产生于天宝元年入长安之后。至于杜甫，大家知道。开元年间还是他的伟大诗歌创作的准备时期，他的所有不朽篇章，都写在“安史之乱”前后。“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由极盛急剧走向衰败，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而文学却于唐代中叶之后走向一个新的高潮，放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诗坛再次呈现百花吐艳的景象。元白、韩孟、柳刘等诗歌流派，互相竞赛，各具风姿；古文运动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天地，韩柳散文成了后世文人学习的光辉典范；传奇小说的发展和成熟，词的兴起，给这一时期的文坛增添了光彩。由上所述可见，唐代文学繁荣的高潮期，并不在“贞观”“开元”之治的鼎盛时期，而在唐王朝已越过它极盛的高峰走向衰落的天宝以后。

明朝，自太祖开国至郑和七下西洋，国势日盛，政绩可观。到明中叶弘治、正德年间，社会经济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然而这种安定繁荣的社会局面，并没有给文学带来新的发展和繁荣。明初几十年内统治文坛的“台阁体”，把诗文当作维护封建统治和点缀太平盛世的工具，内容空虚，艺术平庸。弘治年间，倡导复古运动的前后七子，取代了“台阁体”在文坛的统治地位，他们盲目摹拟古人，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的作品，大都以古色古香的形式掩盖苍白空虚的内容，正如茅坤所批评的那样，是“以艰深之辞文浅近”。明代前期文学上真正杰出的成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划时代作品的问世。但这两部著作显然不是在明王朝这块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三国和水浒故事早已广泛流传于民间。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亲身经历了元末的

大动乱，他们在农民大起义中扩大了眼界，丰富了生活和斗争经验，因而才写出了具有丰富社会意义的作品来。明中叶之后，封建统治阶级走向腐化堕落，宦官专权，特务横行，政治危机日渐加深，农民起义和市民运动此伏彼动，明王朝与蒙、满、倭寇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然而明代文学的繁荣局面却恰恰出现在明中叶之后。著名的神魔小说《西游记》，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家庭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二拍”，在我国小说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明代前期的剧坛，和诗文一样也充斥着点缀升平和宣场封建道德的作品。中叶以后，戏曲创作打破了长期沉寂的局面，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作家作品，如梁辰鱼的《浣纱记》，无名氏的《鸣凤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等，成为我国传奇创作的繁荣时期。杂剧创作也出现了新的成就，康海的《中山狼》、徐渭的《四声猿》影响尤为深远。诗文的成就虽不及戏曲小说，但象归有光、李贽、袁宏道、张岱等人的作品，能摆脱传统古文的格局，不事格律雕饰，言之有物，自由流畅，较之前期诗文，无疑有很大进步。

清朝入关以后，对被征服者实行了残酷的镇压、奴役和掠夺。社会经济虽然缓慢地得到恢复，但民族歧视和高压政策却引起了全国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抗。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因之爆发。汉族起义的农民军和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对清征服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就在这充满血与火的动荡年代里，文学却出现了繁荣局面。由明入清的文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魏禧等，都亲身经历了急烈的社会大动乱，目睹过国破家亡的惨状，因而他们的诗文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浸透着

鲜明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精神，格调大都苍凉沉雄，悲歌慷慨。康熙朝，小说和戏曲成就也很突出。宣扬爱国精神的《说岳全传》，歌颂农民起义的《水浒后传》，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揭露社会黑暗，批判封建礼教和科举制度的《聊斋志异》，在文言小说的创作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李玉的《清忠谱》，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反映了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抒写了兴亡之叹，无论思想和艺术都达到了清代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清代社会经济经过初叶七八十年的恢复，进入了繁荣和发展的阶段，社会安定，人口增加，耕地扩大，产品丰富。乾隆时期清王朝的繁荣臻于顶点。与此同时，统治者进一步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一方面引诱知识分子脱离现实，钻入故纸堆中，走上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在此时期内，文学创作失去了前一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气，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弥漫文坛，诗文中塞满古书古典，枯燥乏味。除了《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两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外，小说戏曲也多平庸浅陋之作，还有不少反动落后的作品。

由以上汉唐明清四个统一王朝的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出，二者的繁荣期是不相重合的，即是说社会的安定，经济的昌盛，并不能直接导致文学的繁荣。我们再看一看，当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文学发展的情况。

战国，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当时列国争霸，互相攻伐，兼并战争剧烈频繁。然而正是在这纵横捭阖，风云变幻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繁荣

的高潮。汉魏之际，朝廷衰弱，无力控制政局，各地豪强称雄割据，互相兼并，弱肉强食，战祸连绵。短短几十年内，人口锐减，十不存一，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但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文学”却正出现在此一时期。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都是军阀混战的目击者甚至参加者。这给了他们深入了解社会的特殊条件，因而在他们的诗歌中，才反映了广阔的历史内容，传达出时代的呼声，形成了“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造就了我们古代文人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南宋，这是一个充满着血与火，交织着屈辱与抗争的时代。残酷的现实和御侮图存的时代精神，扫荡了北宋后期江西诗派和格律词派脱离现实，追险务奇，雕章琢句的风气。抵抗侵略，收复失地，保卫国家的呼声，成为此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旋律。陆游、辛弃疾的诗词中汹涌澎湃的爱国激情，代表了时代的最强音。他们是我国文学史上爱国诗人最杰出的代表。此外，诗人陈亮、曾几、陈与义、范成大，词人张孝祥、张元干也都创作了许多慷慨激昂的爱国诗篇。

从以上三个时期看，社会的动乱恰恰造成了文学的繁荣，这正如清代评论家赵翼指出的那样：“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社会的承平没有导致文学的昌盛，而社会的动乱却可以造成文学的繁荣。应当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

让我们先来考查一下，优秀的作家、作品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主客观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当然，这种反映是艺术的反映，是通过作家的审美活

动来完成的。作家要正确地、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首先要了解生活，熟悉生活，要具有广博丰富的生活经历。足不出户，闭目塞听，孤陋寡闻的人，决然成不了优秀的作家。其次，要有理想，有追求，有鲜明的是非和强烈的爱憎。安于现状，志满意得，消尽人间烟火气的人，绝不可能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来。再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较强的表现生活的能力。生活、思想、技巧，这三者是什么优秀作家缺一不可的。这三条，除了写作的技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技巧和它所表达的内容不能截然分开，因此它只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较少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外，其它两条都同作家生活的客观环境、同他所处的社会、时代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优裕富厚的物质享受，容易消磨人的意志，难于产生创作激性。而穷困潦倒的命运，坎坷踣顿的遭际，常常促人感奋，使之产生不平之鸣，萌发出变动现实的要求。作家将这些曾经深深激动过自己的生活，艺术地再现出来，当然就易于产生感人的力量。韩愈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就是对这种现象的精辟概括，其中当然包含了他们自己的深切体验。

社会的动乱，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破坏了人们生活的正常秩序，迫使许多作家从自己原来狭小的生活天地里走出来，置身于广阔的社会斗争的风浪中。他们或者亲历战乱，目睹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或者辗转逃亡，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或者驰骋疆场，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而战。现实生活的急剧变动，不但大大开拓了作家的生活领域，丰富了创

作源泉，而且给作家思想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他们对现实的矛盾有更敏锐更深切的体验。尽管他们的地位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时代的心理，即对现实压迫的反抗，对兴亡变化的感叹，对国家统一、民族解放的关心。这就使他们的作品能较真实地反映社会历史面貌，更加富有现实意义。屈原的《离骚》，曹操慷慨沉郁的乐府诗，杜甫的“三吏”、“三别”，陆游、辛弃疾的爱国诗词，都可以说是沧桑巨变的时代的产儿。恩格斯有句名言：“义愤创造诗人。”这句话揭示了国家民族的忧患同文学繁荣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值得我们深思。

相反，当封建统治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较为缓和，多数知识分子生活比较安定。没有切肤之痛，也就少有不平之鸣。作家们或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如汉大赋的作者；或则吟风弄月，采丽竞繁，以艳丽的词藻掩盖着苍白的内容，如齐梁至唐初的宫体诗的作者；或则从古书中讨生活，玩弄典故，故作深奥，追求雍容典雅、温柔敦厚，如北宋后期的江西诗派、明初的“台阁体”诗派和清中叶的乾嘉诗人。这些并非发自内心的激情作品，仿佛制作精巧的纸花，也许它很美丽，但终究缺乏动人的魅力。这里还必须说明，上面我们所谈封建社会的稳定，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即使在所谓清明盛世，也会由于封建专制的固有弊端而生出许许多多不合理的事情。一些有才能的作家也可能由某种原因而受到压抑，甚至打击、迫害。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必然激起他们对黑暗政治的愤慨不满，从而创作出具有批判意义的作品来。司马迁的《史记》，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恩格斯说过：“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那末，我们在上面所说的现象，是否违背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呢？我以为对恩格斯的这段话，应当从宏观认识上去考虑，不能作狭隘的、机械的理解。恩格斯的话包括如下两层意思：第一、精神生产必须以物质生产为基础。作家进行创作，首先要吃饭穿衣，要读书识字，要有书写、印刷工具，要有学校，而这些都离不开社会的物质生产，离不开经济基础。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原是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变成了荒凉的战场，受到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大都南逃。因此，在北魏统一中原前，北方几乎没有文学作品流传下来。这就证明了文学对社会经济的依赖性。第二、社会经济的性质决定着文化的性质。《红楼梦》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只能产生于封建社会行将崩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缓慢形成的清代，而不可能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前期或中期。这说明文学不可能脱离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发展。但是，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是远离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经济对于文学，只是在“最后”的意义上才有制约作用。因此，文学并不随经济基础的变化马上变化，不和经济的繁荣或衰落同步。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中说：“关于艺术，谁都知道，它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物质基础相适应的。”

载《南阳教育学院院刊》创刊号

借男女情事以寄意

——谈古诗的一种比兴手法

借男女之间的爱慕、追求、相思、失恋、离异等现象以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中某些问题的感受和思考，这是在我们读古诗时常见的一种艺术手法。读者和评论家们也常为此类诗中寄托何事、或有无寄托而揣测、考证、争论。这种手段最早见之于屈原的辞赋。在《离骚》、《抽思》、《思美人》等篇中，作者多次以男女婚嫁象征君臣遇合。不过诗中男女所影射的对象并不固定，有时以美女自喻，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是以容貌的美丽比喻自己才能出众，借女性之间的争宠，斥责小人的嫉贤妒能。有时又以美女喻楚王，如“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九州这么广大，难道只有这里才有美女？这是屈原想离开楚国时所持的理由。这里所说的“女”显然指楚王。有时并不确指，如“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责备对方不忠于爱情，借指楚王对自己的信任不能始终如一，但其中男女各何指则不能确定。有时美女则系泛指，如作者上天入地，浮游八方所追求的美女宓妃、娥女、二姚，可以指贤君，也可指贤人，也可理解为作者的理想。在屈原借男女之事来抒情时，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美和贤是一致的。他对女子容貌美、服饰美的

描写，即是对人的修养和才能的肯定；第二，男女之间的爱情和婚姻，同君臣关系一样，都是很庄严的，很圣洁的，都应当相互忠诚和始终如一。

以美貌喻贤才，以男女喻君臣，屈原的这个创造，后来就成了我国古诗创作的传统手法。东汉张衡的《四愁诗》写怀人之愁，就是借男女情思来寄托政治感慨的。诗中以美人喻君子，以珍宝喻优美的品德，以水深、山高、雪大喻小人堵塞贤路，显然受了屈原作品的影响。曹植的《美女篇》和《杂诗·南国有佳人》两首诗的构思和写法，也明显是从屈赋学来的。例如，《离骚》说“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美女篇》说“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都是用缺少良媒为喻来慨叹世无知己。《离骚》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美女篇》中“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杂诗》说“俯仰岁将暮，荣耀难持久”，都担心功业未就而韶华已逝，前后的传承关系是很清楚的。但是曹植在运用这一手法时有了新的发展，它不再象屈赋那样只是用一些分散的比喻句来表达感情，它通篇象征，结构完整而集中，主题单一而明朗。再者，屈赋写美人的容貌，只是点到为止，并未进行具体描绘，而《美女篇》在这方面却用赋的手法对美人的仪表、服饰、风姿做了细致而生动的刻画：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摇，轻裾随风还。

顾盼遗光彩，长啸气如兰。……

这些铺陈夸饰、洋洋洒洒的描写，占了诗的大半篇幅，给人极鲜明的印象。

以闺怨或宫怨的题目来表达贤士不遇的主题，在唐诗中

更为多见。李商隐在《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中写道：“青楼有美人，颜色如玫瑰。歌声入青云，所恨无良媒。”色艺双绝却不能适时出嫁，写得很明快，风格近于曹植的《美女篇》。而他的《无题》（其四）就深微婉曲得多了：

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重杨岸。

东家老女嫁不售，白日当天三月半。

溧阳公主年十四，清明暖后同墙看。

归来展转到五更，梁间燕子闻长叹。

在樱花盛开，垂杨轻飏的春天里，从河岸上一条寂静的深巷传来如泣如诉的丝竹之声。原来是一位婚嫁失时的老姑娘，在这丽日当空的暮春时节，借音乐来自伤迟暮。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说“臣里之美者，莫若东家之子。”可见“东家老女嫁不售”并非因为丑女难嫁。那到底原因何在呢？诗人并不直说，而用后两句诗作了简接回答：年纪轻轻，才十四岁的溧阳公主却能夫妻同游，满有兴致地欣赏清明时分的和煦春光。溧阳公主是梁简文帝的女儿，此处借喻贵族女子。很明白，“东家老女”嫁不出去的原因，当是家境贫寒。李商隐这首诗把哀叹才士不遇的主题，扩展为愤慨社会不公，思想意义提高了，写法上也较为委婉含蓄。李商隐还有一首绝句《过楚宫》把男女情事作为人世间的一种极其高尚而圣洁的感情来加以赞扬。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

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

楚王和巫山神女欢会之事虽然已成遥远的过去，但巫山云雨至今还笼罩着山上红艳的枫林。一般世人都贪恋着人世间的各种欢乐，只有楚王还执着地回忆着美好的旧梦。在这里，

作者把襄王与神女的云雨之事，升华成了和凡夫俗子的男女衣食等“人间乐”相对立的一种美好而高尚的理想。可以认为，这首诗里的楚王即是诗人自喻。李商隐对于人生有着自己的追求，尽管这些追求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地幻灭，但他仍然不甘心于庸俗的生活，坚持着幻灭中的追求。诗用“尽恋”和“只有”做对比，表现了自己在孤独中继续奋斗的那种自豪感。

通过宫女生活来反映政治斗争，在唐诗中也属常见。封建朝廷上的君臣关系同宫廷内的王妃关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专制制度的体现，只不过表现的领域不同。一见之于政治生活，一见之于私人生活罢了。李商隐的《宫辞》就深刻地反映了此种现实：

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移失宠愁。

莫向尊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

君王的恩宠就象河水那样不停地流动，今天宠幸这个宫女，明天又会宠幸那个宫女。暂时得宠者唯恐君心转移，而失宠者则只好在愁苦中了一生。因此作者提醒那些新得宠的宫女不可得意忘形。更不要去嘲笑那被冷落的宫女，须知好景难长，秋风已经不远了，花还能开得久么？诗歌对宫女的心态作了十分深入的刻画，对他们的命运作了准确而形象的概括。这首诗是写宫女的，但它包涵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内容。晚唐时期政局动荡不安，朋党倾轧剧烈。今朝上台，明日下野，这类事屡见不鲜。李商隐不只目睹其身，而且身受其害，对此自然感慨很深。因此，诗中对得宠宫女的提醒，未必不是对受宠幸的当权者的警告，而“得宠忧移失宠愁”则可以认为是对所有封建臣僚的心理的生动写照。试想在封建